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期
2015年4月，頁159-190
國立台灣文學館

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關於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與魯迅的評述*

許俊雅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摘要

魯迅與殖民地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然而，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依舊有相當多史料未被留意，甚至因未見這些史料，而遽下結論。因此本文乃就以下論點提出檢討，一是台灣得到魯迅的消息多由日本傳入，而非中國直接傳到台灣。二是台灣人對魯迅文學地位的確認及理解其文學的歷史意義，需等到1936年魯迅去世時，而台灣對魯迅的評價，也因戰爭爆發而中斷。在對疑義釐清過程中，不僅建構殖民地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認識與理解歷程，對於魯迅作品在台的傳播與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也更為清朗可辨。本文舉出1936年魯迅過世前，台灣文壇、報刊對魯迅的關注及對其作品的評價，進入1940年代，即使戰事日亟，台灣作家依然私下閱讀魯迅的作品，在新舊文學論戰之際，雙方又如何援引魯迅以相互攻防，論辯文學。

關鍵詞：魯迅、台灣文學、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朱點人

＊ 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提供寶貴修改建議，筆者受益良多，謹致最高謝忱。修訂未盡人意處，當由筆者自負文責。

Re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Lu Xun o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Concerning Taiwan Literature and Its Reception of Lu Xun

Hsu Chun-Ya

Professor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Lu Xun and Taiwan literature is rich. However, among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there are still 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 remaining unnoticed. Some conclusions were made without examining these document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propositions (1) that Taiwanese people received the message regarding Lu Xun mostly from Japan, not directly from China, and (2) the acquaintance, recogni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Lu Xun's literary status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works did not come about until his death in 1936, and was interrupted be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his paper, through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reconstructs the process of intellectuals' acquaintance with Lu Xun under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and makes the observation clearer on the process of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Lu Xun's works in the Taiwan's literary circle. This paper shows the evaluative attention of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newspapers in Taiwan to Lu Xun and his works before he died in 1936. After the 1940s, in spite of the war, writers in Taiwan still read Lu Xun's works privately. This gives us a new image of Lu Xun in Taiwan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our understanding the New- Old Literature debate in which Lu Xun's works were widely cited.

Keywords: Lu Xun, Taiwan Literature, Japanese Rule, New-Old Literature Debate, Zhu Dian-ren

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關於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與魯迅的評述

一、前言：魯迅與台灣文學研究成果及侷限概述

對於「魯迅與台灣文學」的研究從台灣1987年解嚴前後，研究成果漸多，在台灣閱讀魯迅的禁忌在1980年代已經鬆動，而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研究的起步，也大致在1980年代，因此兩岸都累積了相當多的論文篇數，在蔡輝振〈魯迅在台灣——探討台灣對魯迅研究的成果〉[1]一文即羅列了一百多篇，分析研究內容，並比較與大陸研究之差異，這是2005年的研究情況，經過八年，研究篇數自然更多，台灣且有以之獲得博碩士學位的，研究成果幾乎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了。但綜觀其研究取向，不外幾個層面，即是魯迅作品在台灣的轉載，魯迅過世後台灣報刊的悼文及報導、台灣知識分子與魯迅的接觸及台灣戰後初期以來的魯迅傳播歷程的考察，其中黃英哲對戰後初期魯迅傳播的歷史考察，尤為力作。討論陳儀政府時期在台灣施行的文化政策，許壽裳如何以「魯迅精神」重建戰後台灣文化，及當時台灣文學界對魯迅的受容情況，並陳述台灣作家如何利用魯迅精神表達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等等。而在東亞學受到關注的氛圍下，陳芳明從〈魯迅在台灣〉進而到〈台灣與東亞文學中的魯迅〉[2]的強調，將魯迅研究推擴到東亞各國的連結，以解決某些問題，論述全面而深

1 蔡輝振，〈魯迅在台灣——探討台灣對魯迅研究的成果〉，《上海魯迅研究》16期（2005.04），頁108-133。該文搜羅已相當嚴整，但尚可補充台灣早期雜誌所刊的研究，如羅家倫〈話魯迅當年〉、韓韓〈從西蒙列斯到魯迅〉、周冠華〈魯迅面面觀〉、陳綏民〈魯迅的悲劇〉、林衡道〈魯迅與「第三國際」〉、尹雪曼〈漫談魯迅〉、張放〈魯迅百年論定〉都刊登於《文學詩潮》。陳敬之〈魯迅〉、程其恒〈魯迅的真面目〉刊《暢流》。他如夏濟安遺著峯子著譯〈剖析魯迅作品〉、劉心皇〈魯迅與託派〉、姜穆〈魯迅與共產黨〉、〈由周令飛談魯迅的性格〉、陳炳良〈魯迅與共產主義〉、王逢吉〈幸運和遺憾——談魯迅散文〉、唐紹華〈魯迅舊資料有了新發現〉、本刊（反攻）資料室〈周揚貶抑魯迅以反毛的實情〉等等。

2 前文收錄在中島利郎所編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5），頁1-38。後文收入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 當代文學六十年》（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03），頁167-189。

入，其他如林瑞明、張恆豪、中島利郎、澤井律之、楊傑銘、陳建忠、游勝冠、廖淑芳、朱雙一、朱立立、古遠清等都做出貢獻。

在台灣，自五〇年代至八〇年代末期，魯迅文學自然是思想不正確的禁書，政治力操作下的魯迅被妖魔化，而文學閱讀者也無緣透過文字與魯迅的精神相遇，在這戒嚴時期，魯迅的著作只能以一種幾乎是沒有封面的封面與讀者相見，而其著作的曖昧存在，使得孺慕其作的台灣作家，也在著作中留下淡淡的暗示及深刻的隱喻，如同郭松棻的〈雪盲〉：「魯迅文集　台灣總督府監印」、「陳昆南　昭和四年」、「書蟲已經蛀穿了書頁，一個一個小小的洞疤佈滿在每一頁相同的位置上」[3]，做為遺物的《魯迅文集》，連結起三代人的精神傳承，及今日知識人的命運與時代氛圍。至1987年解嚴，見不得光的魯迅文學才被客觀詮釋，詮釋權不再掌握在國家機器及少部分人手裡，同時也開始追溯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與魯迅的關係。中國大陸的研究則偏重於魯迅對台灣文學、台灣作家的影響，強調自覺接受魯迅的思想與文學。然而，在眾多研究成果中，魯迅與台灣文學的關係，依舊有若干史料未被留意，甚至因未見這些史料，而遽下結論，本文因此擬就幾個層面討論殖民地台灣知識分子對魯迅的描寫視點，並針對幾篇評述中之疑義相與析論，以更清晰釐定殖民地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對魯迅的認識與理解歷程。[4]

二、擎雲（葉榮鐘）〈文藝時評〉的解讀／台灣得到魯迅的消息多非中國直接傳到台灣？

擎雲（葉榮鐘）於《南音》發表一篇談及魯迅的〈文藝時評〉，「我們自從『壁下譯叢』——1929年出版——以來至今日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很感到寂寞。」[5] 楊傑銘根據葉榮鐘的說法，認為「台灣要了解魯迅的近況都必須透過日本的報章雜誌報導，以及出版關於魯迅的書籍或是著作才

3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7），頁211。

4 關於反魯學者的論點，本文並未全面性說明，以其本文討論重點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在1940年戰爭期，當時擁魯、反魯者皆有。至於中國及戰後的台灣文壇亦有反魯擁魯兩派勢力，為免論述失焦，因此省略全面性研究情況的敘述。

5 擎雲（葉榮鐘），〈文藝時評〉，《南音》1卷3號（1932.02.01），頁14。

有可能間接獲得魯迅的訊息。……單以魯迅的消息而言，在日本殖民政府對台言論緊縮之後，台灣得到魯迅的消息多由日本傳入，而非中國直接傳到台灣。也就是說，相較之下，台灣與日本在文化上的交流是比中國更為頻繁，台灣讀者能透過日本文壇轉而了解中國文壇發展的情況，而魯迅的文化傳播即是一例。」[6]

1929年後至葉文發表的時間1932年間，不能看到魯迅作品，恐怕只是葉榮鐘個人的經驗，以此推論「台灣得到魯迅的消息多由日本傳入，而非中國直接傳到台灣」，甚至進一步以魯迅在台的文化傳播，得出「台灣與日本在文化上的交流是比中國更為頻繁」，其間仍有漏隙處。從1929年至1932年間，台灣沒有從中國獲致魯迅或其他中國作家的消息嗎？或者看不到其他中國作家作品的傳播嗎？如果從《臺灣日日新報》、《三六九小報》所刊作品，即可知中國文化、文學所占比例之多，而《臺灣新民報》在1929年後依舊有郭沫若、劉大杰、張資平等人的作品，甚至引用魯迅作品或報導其消息的新聞也不虞匱乏。如1929年11月，定一〈曲解　第一〉：

> 豈有無病而竟好呻吟的？我想他們都是不得不呻吟的、都是懷著悶悶之情而無處可訴、所以發表于文章、小說、詩歌、都是有所寄託。他們何嘗無病？他們處於不得不呻吟的境遇的時候就是有病。自古已然、況在此資本主義爛熟期、煩悶交至、懊惱簇生的今日、不得逞者、不爽快者、誰會無病？誰不呻吟？胡適者流、我想必定是他們家有餘裕、他們的地位境遇配得過他們的學問、所以他們不會呻吟、不然恐要痛哭流涕耳、何獨呻吟、呻吟者的心情他們何嘗嘗得！
>
> 魯迅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象徵、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有人向他說：「還有許多人講話和寫文章、還可以證明人心的沒有全死。可是這裡需要有分別、必需要是一種不平鳴的呼

6 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72。楊傑銘，〈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國史館館刊》26期（2010.12），頁47-73。

聲、不管是冷嘲或熱罵、纔是人心未全死的證驗。」[7]

定一以魯迅的言語來說明殖民體制及資本主義下的台灣，講話和寫文章都是有病而呻吟，很特殊的是特別以「胡適者流」批評他們不會呻吟，呻吟者的心情他們也不曾嘗得。文中的「有人」，即是「徐炳昶（旭生）」，這段話見於《華蓋集》中的〈通訊〉，後來魯迅校畢本書後又寫了「後記」說：

本書中至少有兩處，還得稍加說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話，是出於ZM君登在《京報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時我正因為回答「青年必讀書」，說「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很受著幾位青年的攻擊。ZM君便發表了我在講堂上說的話，大約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給我解圍。現在就鈔一點在下面——

「讀了許多名人學者給我們開的必讀書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動我的是魯迅先生的兩句附注，……因這幾句話，又想起他所講的一段笑話來。他似乎這樣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徵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時候，他並不說什麼；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最近像吳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賦彼其詩」，齊燮元先生的「放下槍枝，拿起筆桿」更是明顯的例子了。』」[8]

轉載魯迅之文較少出自《華蓋集》，但從「定一」此文，可以看到不僅

7 定一，〈曲解 第一〉，《臺灣新民報》282號，1929.11.03，頁8。

8 文末署：「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畢記。仍在綠林書屋之東壁下。」見魯迅著，《華蓋集第4集》（中國上海：北新書局，1929.05），頁16、187、188。又見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三卷・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頁26、173-176。

引用《華蓋集》的「通訊」文字，該文筆致亦受魯迅影響。《臺灣民報》早在四年前（1925年）轉載了《華蓋集》中的一篇〈犧牲謨〉，雖然該文被視為雜文，但林瑞明認為是一篇形式創新的小說，並指出賴和小說〈一個同志的批信〉，是向魯迅學習之作。其情節是以獄中同志向舊日同志求援開始，然而已經從政治運動撤退的一方，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捨不得寄錢給對方，卻在官方募捐的壓力下，將捨不得寄出的款項挪捐給官方，置獄中同志於不顧。賴和在呈現情節方面，多了一些敘述，而全文有三分之二以上皆採用單邊會話體，內容則同樣是同志遺棄同志的情節，[9] 其摹擬影響之跡，誠然可識。

1929年的《灌園先生日記》，留下了他閱讀魯迅作品的紀錄，如「本朝讀魯迅《而已集》數篇」，[10] 此書是魯迅在1927年間所寫的雜文29篇，包括〈黃花節的雜感〉、〈革命時代的文學〉、〈文藝和革命〉等。進入1930年，我們又看到《洪水報》刊出劉宗敏〈無題〉[11] 新詩，此作是模仿魯迅《野草》所載〈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詩後附記云「此仿其調而作之者。」編輯在此並未直接轉載魯迅原詩，而是以劉宗敏仿作刊出，劉宗敏何許人也？無法得知，其作是否也是《洪水報》轉載自中國？亦一樣無解，但可以理解的是劉氏閱讀過魯迅的詩，《洪水報》的刊載等於間接引介了魯迅之作，讓讀者再次憶起魯迅。此詩雖是打油之作，但有其積極的思想意義，而且有現實性之隱射意味。[12] 根據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魯迅述及孫伏園辭去《晨報副

9 林瑞明，〈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國文天地》7卷4期（1991.09）。後又收入氏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3.08）。

10 日期是1929年3月16日，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二）》（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另同年5月28日「讀……蘇俄的〈文藝論戰〉一篇」，此書書名宜是《蘇俄的文藝論戰》，譯者任國禎是「未名叢刊」之一種，但魯迅寫了「前記」，林獻堂應亦閱讀過此文。灌園先生對魯迅作品一直不曾輕放，在1938年時他又閱讀了魯迅的小說〈社戲〉、〈風箏〉。

11 劉宗敏，〈無題〉，《洪水報》創刊號（1930.08.21），頁6。此詩四小節最後一句「不知何故兮」之「兮」字，均誤作「今」，茲徑改之。

12 詩中如「我的所愛在高山」，「由她去罷」，宜是指徐志摩。1924年徐志摩在北京報刊上發表不只一首失戀意味的詩，詩中即有「高山」、「去罷」這類詞語。如6月17日《晨報刊副》上的《去罷》一詩。重要的是，徐志摩是個失戀的人，而徐志摩失戀的對象林徽因，已是梁啟超的未婚兒媳，這都是北京文化界人盡知的。魯迅的「我的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有可能指向徐志摩。「我的所愛在豪家，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豪家可能是林家和梁家，而當時梁家是有汽車的。韓石山著，《徐志摩傳》（中國北京：文藝出版社，2004.08），頁265。另見陳漱渝〈在魯迅蜚聲中外的散文詩集《野草》中，有一篇形式特異的作品《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魯迅為什麼寫《我的失戀》？〉，《湛江日報》，2009.10.18，6版。

刊》編輯與他有關，原委是有位留學生乘孫伏園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魯迅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魯迅說「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13] 登在《洪水報》的擬作〈無題〉，作者劉宗敏大約也是從《語絲》或《野草》上讀到的，就魯迅作品中，這首作品向來也是比較被輕忽或漠視的，劉宗敏卻以之仿作，且出現在台灣左翼報刊，不能說不是一特殊現象。

而稍晚葉文同樣刊登于《南音》的「吼」（周定山）〈草包ABC（六）文學的暴君〉一文，就提到數年前錢杏邨大概是受著北伐空氣的浸潤，將他生殺預奪的批評權，發揮的淋漓盡致。魯迅就是錢氏「攻擊的標垛了。說什麼沒有時代性的表現？任他如何用了紹興世襲的師爺的刀筆，冷酷的描寫，都屬義和團以前的社會現像（象）？不是革命精神的表露，民眾的怒吼，現時代的背景？……文學不描寫革命軍的威武雄邁，就屬反動的文學？領教！表現求速開赦賜死的窮百姓的慘叫，也不行嗎？呵！『文學的暴君』。」[14] 從文中來看，周定山對於當時錢杏邨文章及「革命文學」的背景應有所涉獵，但很顯然的是他不滿錢杏邨對魯迅的攻擊，因而以「文學的暴君」指稱錢杏邨的所為。錢杏邨之文宜是指〈死去了的阿Q時代〉、〈死去了的魯迅〉[15]，文中批判魯迅措詞嚴厲，魏家駿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把魯迅作為一個與革命文學主張相對立的活的標本，批判他與現實的革命鬥爭要求不相適應的文學風

13 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 二心集 偽自由書》（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頁170-171。

14 周定山，〈草包ABC（六）文學的暴君〉，《南音》1卷9、10號合刊（1932.07），頁26。周定山〈草包ABC〉篇名或受茅盾《小説研究ABC》之影響。

15 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原載《太陽》（1928.03）、《我們》月刊創刊號（1928.05）、〈死去了的魯迅〉，《語絲》4卷1期（1928.03.25），收入孫郁編，《被褻瀆的魯迅》（中國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10），頁58。

格、表現形式和表現技巧，借此造成一種宣傳效果，在文學領域裡揭櫫革命的旗幟。」[16] 綜觀全文，吾人可知周定山熟讀魯迅雜文，[17] 對中國文壇的現況亦極清楚，這除了與他曾赴上海與魯迅有接觸外，他本身即是熟讀中國典籍的知識人。楚女（張深切）在〈評先發部隊〉一文中對周定山及其文評述道：「標題『還是烏煙瘴氣蒙蔽文壇當待此後』，這篇文章最合吾意，文章很美麗，內容很充實，針針見血令人一讀為之三嘆。他所用的文字很妥當，筆法稍近魯迅的體式。很好！」[18] 確實周定山雜文的筆法有近似魯迅文之處，這在當時台灣文壇評論界，已經有多人指出，張深切即是其中一位，而張深切早在1927年就與張秀哲、郭德金拜訪過魯迅，視魯迅為導師。張深切在回憶錄中，提到魯迅有一回去看中國牙醫，但一見到治療器具全生銹了，馬上嚇得跑了出來，最後牙疼得受不了才去找日本醫生治療，魯迅談到這段經歷，對張深切自嘲地說：「牙痛是無法可忍的，沒有法子，只得到沙基去找日本醫生看了……真是可恥的事。」（頁343）魯迅覺得他不僅是可恥去看了日醫，更可恥於一種「中國人本身的精神問題」。魯迅確切地明白中國是弱在自己身上，仇視他國是無益的作法。[19] 張深切對於魯迅其人其作自然也是熟悉的，因此在看到周定山作品後，立即聯想到魯迅的文筆。

周文與魯迅之文相近之處，如〈還是烏煙瘴氣　蒙蔽文壇當待此後〉此文，即與魯迅的烏煙瘴氣的水師堂及1933年11月5日〈致姚克〉所寫極為相似，魯迅介紹了當時的上海文壇，信件末了說：「上海也冷起來了，天常陰

16 魏家駿，〈覺醒的階級和死去的時代——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一種解讀〉，《文學評論叢刊》6卷2期（2003.10），頁75。

17 周定山曾兩度赴上海，據宋澤萊所言，周氏曾獲魯迅資助，才得以出入上海一帶。宋澤萊有新詩描述寫周定山。由於是周定山口述，魯迅日記中一點兒都沒提到，細節如何，無法得知，謹暫記於此。筆者以為魯迅本名周樹人，而周定山本名周火樹，二人除同姓，名字還有一個字相同，或許因此有著特殊情緣。

18 楚女（張深切），〈評先發部隊〉，《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11），頁7。

19 張深切隨即對魯迅說道感情和理智現時是需要分開看待，中國科學的落伍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無須對此事感到可恥。魯迅則就張深切的見解進而提升一層，他認為去看了日本牙醫，並非是僅止「技術」因素，而是因為中國醫生連最基本的醫療器具也不清理乾淨。由此可見魯迅並非空喊口號的人，他深刻體認中國人封閉、腐敗的舊傳統與墮落的國民性，冀求國民要從心理層面革新起。羅詩雲首先用了這一則資料。見〈張深切《里程碑》的魯迅印象——先從自己救起〉（來源：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13，檢索日期2014.08.25）。

雨。文壇上是烏煙瘴氣，與『天氣』相類。」[20] 魯迅常用「烏煙瘴氣」來形容，《朝花夕拾・瑣記》[21] 也說「烏煙瘴氣四個字來概括，庶幾乎其可也。」除雜文外，周定山小說〈旋風〉亦可見魯迅《狂人日記》、祥林嫂的影子。小說中的臭萬妻，被騙走家中土地，還被迫賣掉乖巧標緻的女兒，導致「近來常失神地獨自呆坐著，精神上像喪去了一種什麼重要的機靈似的，小孩的啼饑也忘記了喂乳。做起事來，已不同前那麼有勁」，想到將來要如何度日，就陷於悲慘的絕望中，眼前一花，彷彿四圍都是張牙舞爪的猛獸，作勢欲噬人，從這以後，逢人便嚷著：「哎喲！救人呵，要咬我！」朱雙一便認為這何嘗不是又一個祥林嫂，而最後「救人呵，要咬我！」的呼喊，也難免讓人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22]。〈也是隨筆〉中，也引用魯迅的話「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死者倘不埋存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23]（《華蓋集續編・空談》），說明其處事的立場：「世上如果還有想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另〈也是隨筆（三）〉裡說「魯迅先生眼裡的叭兒狗」，其嬉笑怒罵、諷刺批判力道，都可瞭解周定山對魯迅作品的熟悉及所受之影響。[24]

其次，台灣對於魯迅的消息多由日本傳入嗎？筆者認為台灣人對於魯迅動向頗關注，這從聽聞魯迅被捕消息及過世時的反應可見。1931年2、3月間《臺灣新民報》刊出三則與魯迅相關之新聞，雖然新聞報導魯迅被捕一事，第三則已經證明空穴來風，但從這三則新聞，可以看出《臺灣新民報》對魯迅動態的關注，而這三則新聞恐怕與《盛京時報》、《順天時報》、上海《社會日報》

20 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08），頁432。

21 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 二心集 偽自由書》，頁263-270。引文見頁268。

22 朱雙一，〈從祖國接受和反思現代性——以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的祖國之旅為中心的考察〉，彭莉主編，《台灣研究新跨越 兩岸觀察》（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06），頁407。

23 此二則引文，見〈紀念劉和珍君〉、〈空談〉，《魯迅全集・第三集・華蓋集續編》，頁257-265。

24 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07），頁120、126、127、128。關於周定山雜文筆法近似魯迅之論證，可期待他日專文討論，為免歧出之線太多，謹略抒如上。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點。

有關聯，[25] 而做為官資的《臺灣日日新報》並未刊載此則新聞，該報也從未刊登過魯迅作品，只有在魯迅逝世時刊登過報導。《臺灣新民報》第一則新聞標題作：「左翼作家的魯迅　惹起莫須有文字獄　有不滿足政府的表示　這是否犯罪的理由？」，文中說：

> 在中國文壇享受大名很久的魯迅、突於一月二十日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了。魯迅即周樹人、原籍紹興、久客于北平、今年五十一歲。他的弟弟周作人也是文壇的健將、兄弟齊名、人們稱羨。魯迅的思想之如何、或褒或貶、老實沒有定評。唯他的作品如小說如雜感文、多受國內外人士傳誦、這是誰也不能夠否認的事實。魯迅是左翼作家聯盟員、他對於握有政權以後的革命政府、並不加以稱讚、且有不滿的表示。政府或許要當作過激份子看待也不一定。然而在言論要自由的今日、尤其是革命過程中的國民政府、總不該有封鎖言論強壓思想發達等的行動才對。那末魯迅因為是左翼作家聯盟員、就算是犯罪嗎？這麼只恐誰也不能心服。然則魯迅因何而被捕？政府既沒有發表、一般又找不出別的犯罪材料、所以凡是曾聞過魯迅名字的人們莫不替他驚疑莫定。前番胡適也曾興過「莫須有」的文字獄、幸得無事。這回大家猜疑仍是一樣的悲喜劇吧。唯近來當路的要人、因被共產黨搗亂得神經非常過敏、所以每遇有率直批評黨及政府的人、動輒造出無稽的罪名、加以逮捕監禁種種。使投身在言論界中的人們、要感著不知何時橫禍飛來的不安。自魯迅被捕後國內文人一聽到消息、雖常時立在相攻擊地位的人們、也為代

25　1931年1月20日，上海《社會日報》發佈了一條〈驚人的重要新聞〉：「十七日中午，上海方面接到南京密電，謂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晤之消息。上海警界遂四出搜捕，于晚間七時，捉獲共產黨徒多人，經拷問二日，始於昨日在各中央委員之外，訊得一人，承認系小說家魯迅。當經幹員核對照片，完全符合，魯迅被捕，遂行證實。此項消息發表後，必能振盪全國，有數十萬人拍手，有數十萬人痛苦驚天動地，鬼哭神號」。而《臺灣新民報》此時有轉刊自《盛京時報》、《順天時報》的新聞。據黃旺成受訪稿，知其任職《臺灣新民報》時每天接觸十幾份報紙，黃氏曾說：「我在民報當記者、編輯，撰社論、短評『冷言』，並經常購買天津大公報及上海各種報紙數十種，改寫中國記事，介紹大陸時事。」他在1932年離職，魯迅消息的報導，有可能是透過這樣的管道進來。見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07），頁89。

抱不平。總之因魯迅的問題、很惹起各界人士的注目。[26]

這一篇報導魯迅「享受大名很久」，作品備受傳誦。也透露出當時對魯迅思想的雜音，但報導者立場很清楚，他說其「思想之如何、或褒或貶、老實沒有定評」，即使反對國民政府（革命政府），也不該遭封鎖言論強壓思想發達，甚至加以逮捕監禁。這則在台灣的新聞，就當時背景而言，自然也有講給日本殖民政府聽的意味，同時也是一種對民眾的啟蒙教育。另一篇是「魯迅被捕　經過情形」，雖經過兩周才繼續刊登魯迅被捕之經過情形，但《臺灣新民報》此時仍是週刊，如以日刊而言，也就是經過兩天又再次報導，足見其關懷之情不減。報導云：

魯迅被捕一事、本報前號已報、據知其內幕者言、魯之與左翼作家提攜、係有鄭伯奇者介紹。自攜手後、即組織自由大同盟、豫備參加本年五月中之文藝活動。中央得報、乃下令通緝、魯迅田漢蔣光慈鄭伯奇等、均在其內。當滬上當局得南京密電、謂在共黨執行委員七人來滬、秘密會議、務於最短期間、設法緝獲、當由市公安局會同應法兩界捕房、嚴密探訪、卒於十七日晚、捕獲魯等十餘人。而田漢則於四五月前已出之漢口、轉道東渡、雖一度秘密來滬、顧為期僅三四而已。蔣光慈向與藝術大學女學生吳似鴻賃屋同居、對於自由大同盟之組織、甚為意懶、蓋方慶與吳女士偕魚水之歡、決不肯離去愛情而奔走。然據一部份知者所云、蔣已赴長沙、故此次得能免捕、否則亦與魯迅等飽嘗鐵窗風味云。[27]

從這一則新聞，可以得知台灣知識分子對魯迅被捕一事極為關心，此處特意補

26 《臺灣新民報》351號，1931.02.14，頁7。新聞中提到前番胡適也曾興過「莫須有」的文字獄，在《臺灣新民報》「教部警告胡適　通飭研究黨義」：「胡適因前月于新月雜誌載三篇論文、上海黨部以為違背黨之言論、故呈請懲辦在案、此次竟於上月下旬、教育部奉國府令、對胡適誤解黨義、及總理學説、加以警告、並通飭全國、各大學校長、切實督率教職員、評析研究黨義以免再有與此類似之謬誤見解發生云。」282號， 1929.10.13，頁5。

27 《臺灣新民報》353號，1931.02.28，頁7。

充被捕內幕與參加左翼、組織自由大同盟有關，順帶介紹田漢、蔣光慈、鄭伯奇諸人，在殖民情境下，1930年代初日本當局即大肆拘捕台灣左翼人士，而《臺灣新民報》對左翼文人及其作品的引介並不因之而缺席，王魯彥〈一個危險的人物〉、茅盾的〈騷動〉[28] 郭沫若的〈歧途〉、山田清三郎作、張資平譯〈難堪的苦悶〉[29] 都可在這刊物看到。賴明弘因覺得篇幅應再多刊台灣作家之作品，因而發牢騷說：「台灣XX報（筆者按：指台灣新民報）文藝欄到中國剽竊的茅盾的『騷動』昨已登完了。其後總不見再登小說、台灣的小說稿件如果太貴、中國既成本的小說很多、請再剽竊一二篇來登好吧、際此經濟恐慌時代、要買稿是太不經濟、不如將他國之便書盜來敷衍就算了、這豈不是很便宜的嗎？」[30] 〈騷動〉原作刊《文學月報》1932年2期，與《臺灣新民報》轉刊時間很接近，從這裡亦可看出中國報刊在台灣流動的情況，台灣刊登了這麼多中國作家（含左翼）的作品及文壇的消息，[31] 魯迅消息及其作品應不可能例外不受重視。

經過兩週（事實上即是2月28日後第二次出刊），3月14日再登「魯迅一封信」說明「被逮捕消息　概出於誤傳」，新聞報導引用2月4日魯迅致書李

28 按茅盾的〈泥濘〉，署名「丙生」，因其生年1896年，正是丙申年。刊《臺灣新民報》1930.10.11、18日，原刊《小說月報》20卷4期（1929）。〈騷動〉則刊1933年8、9月的《臺灣新民報》，目前僅見第17回至19回（完）第17回刊登時間是1933年9月2日。

29 刊《臺灣民報》263、264號，1929.06.02、09，9版。原刊《澎湃》1期（1928）。另收錄於《草叢中》（中國上海：樂群書店，1929.06）。

30 賴文僅署名「弘」，「文藝春秋」，《新高新報》391號， 1933.09.15，18版。《臺灣新民報》刊登茅盾的〈騷動〉之後，又緊接著在9月23日起刊登了吳劍亭〈一對夫婦〉八回。此作將葉紹鈞〈平常的故事〉（刊《小說月報》1923年第5期）換了題目，作者換上了不知何許人的「吳劍亭」。此舉與《臺灣民報》1920年代中的轉載之動機已完全不同。不僅此也，10月25日起又刊載蔡建成的《窮》三回，此文作者是張友鸞，原刊於《東方雜誌》22卷6期「新語林」（1925）。因1934年之後《臺灣新民報》多佚失，無法再看到，但想必不乏中國作家之作品。從楊守愚1937年1月7日日記亦可理解台灣作家對於當時中國文學並不陌生且有冒名現象，他說：「抄了小說月報叢刊的『創作討論』在台灣文藝以自己的名義發表；經我發現，而經一吼在東亞鐵甲中暴露的抄字大仙吳鴻爐，今天又在新民報發表諺語的研究了。讀此文，不免叫我起了疑心，隨手把小說月報叢刊底「諺語的研究」取下來一翻，又給我捉住了。像這樣一個欺世盜名的無恥漢，真是台灣文學界的一種害蟲，為肅清此種惡質的文賊，為向上創作精神起見，非再加以一大鐵錘不可。」楊洽人、許俊雅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2），頁121。

31 《臺灣民報》還曾刊載徐蔚南〈一九二七年的李四〉，透過小說介紹了中國革命政府的腐敗。主角「李四」即「歷史」的諧音。作者雖然表面是在寫「李四」的遭遇，實則在敘述1927年的中國歷史。小說以反諷的手法，刻畫出革命官「李四」的跋扈態度，作為日漸腐化的革命軍之代表。一方面反映國民政府的敗壞貪腐，一方面也表現出人民生活困難、經濟蕭條的景況。

秉中信函內容，為闢魯迅被捕謠言，而此信函又根據天津報刊。[32] 以上所述是1929年至1932年間魯迅作品及其消息在台灣的情形，[33] 此後也沒中斷過，1933年魯迅舊詩刊在《福爾摩沙》，1934年後的《臺灣文藝》、《第一線》、《臺灣新文學》更經常援引魯迅作品，這裡僅舉1935年黃得時的〈小說的人物描寫〉，[34] 該文體現了台灣作家對中國作品的接觸與學習，尤其文中舉魯迅《阿Q正傳》為典範。這篇文章分「外面描寫」及「內面描寫」兩部分說明寫小說時如何進行人物的描寫，前者從容貌、服裝（靜的表現）、動作、會話（動的表現），冷靜觀察，藝術性描寫，以耿濟之譯托爾斯泰《復活》中的一段，女囚犯瑪司洛娃的服裝和容貌為例，又以魯迅的譯作《工人綏惠略夫》絕望的女人叫聲、小孩吃驚的神情為例。後者分「情緒」、「思想」、「性格」三方面來說明，依序解釋「情緒」是「據心理學者說，情緒是沒有受理智所支配的一個強烈的有機感覺。如失望，悲哀，恐怖，憤怒，喜悅，嫉妒等都包括在內」、「思想是作中人物的內心生活之一種元素」、「性格描寫是人物描寫底中心，也是內面描寫最困難的一部分。因為作品中的事件和人物的動作以至心境的變化，無不基因於其特有的性格。如動作的遲緩或敏捷，態度的強硬或脆弱，心意的寬闊或褊狹，放蕩或拘謹，品行的優良或惡劣——等，都是性格使然的。」三者總括以魯迅的《阿Q正傳》為例，推舉此作性格描寫的成功。結尾時，談到台灣文壇的創作模式大體是以「事件」作為故事核心，「作者只求很多的問題——聘金廢止，迷信打破，婚姻自由，查某嫺解放以及蓄妾排

32 此則消息刊《臺灣新民報》，1931.03.14，第7頁。文中提到消息來源為天津報刊，經查是登當時沈從文任主編的天津《大公報》副刊《文學》上，2月23日刊出，《臺灣新民報》記者在2月28日尚不知魯迅致李秉中書信手稿已刊天津《大公報》，直到3月14日才披露闢謠消息。從此則信息，亦可知台灣得睹天津《大公報》大約要晚兩週多的時間。事實上從《臺灣日日新報》轉刊《申報》作品的時間，亦多數約差距兩三週以上的時間，可知兩地報刊的流通時間長短。魯迅致李秉中書信見諸魯迅書信集、譯文集、全集等，可參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魯迅作品選》編選組編著，《魯迅雜文書信選》，1972年2月出版及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北方左翼文化運動資料彙編》（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06），頁664。

33 關於1925-1926年《臺灣民報》大量轉載魯迅作品的現象，如〈鴨的喜劇〉、〈犧牲謨〉、〈故鄉〉、〈狂人日記〉、〈魚的悲哀〉、〈狹的籠〉、〈阿Q正傳〉，學界已有周延完善的討論，故本文不再贅敘。至於相關魯迅消息的報導在《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並未見。《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日高生〈支那 文壇第一人者 魯迅氏の印象〉介紹，時間已是1933年4月18日。總的來看，1920年代中的魯迅被引介，主要是透過其創作及譯作。

34 黃得時，〈小說的人物描寫〉，《第一線》（1935.01），頁75-83。

斥——壓縮在一個作品 ，完全像『問題的展覽會』一樣，表面上弄得五花十色，鮮豔奪目，事實上卻沒有什麼藝術價值。」最後期待台島「諸作家，對於人物描寫這方面，盡點功夫去研究」。

黃得時此文引用了魯迅的譯作〈工人綏惠略夫〉與創作《阿Q正傳》為例，這說明了他手中應有魯迅的《阿Q正傳》，是中文版而非日譯版。筆者之所以用「應有」一詞，乃在於〈小說的人物描寫〉一文，其實是從（孫）俍工《小說作法講義》一書節錄縮寫而來，前述引文也幾乎字字相同，甚至舉例的小說片段之起迄也全部一致，如俍工之文在內面描寫「情緒」一項作「據心理學者說是一種強烈的有機感覺，如失望，悲哀，恐怖，憤怒，喜悅，嫉妒等都包括在內。」「思想——是人物底內心生活一種重要元素」「性格描寫是人物描寫底中心，也是內面描寫最困難的一部分。因為作品中的事件，以及人物底一切行為動作表情等均可以說是基因於人物底性格底發展。如動作底遲緩或敏捷，態度底強硬或脆弱，心意底寬闊或褊狹，放蕩或拘謹，品行底優良或惡劣……等均是受人物底性格支配的。」[35] 二文承襲痕跡明顯可見。不同的恰恰是黃氏引了《阿Q正傳》為例。俍工之作為專書，每一說明都舉國外名著數十例以證，巨細而靡遺，但黃氏之作為一短文，只能各舉一例，甚或數則僅以一例統括說明。黃氏所引《阿Q正傳》原文約兩頁，並未見於《小說作法講義》，因此合理推測黃得時應有此本小說，中國文學作品進入台灣的過程，恐有許多管道，因此吾人看到的台灣作家自述幾乎都不約而同提到這樣的經驗：「大陸在這時正流行看30年代文學，魯迅、郭沫若的作品正在流行。我就在這期間對中國新文學發生了興趣，張資平、許地山、冰心、林語堂、胡適、陳獨秀的作品都成了我閱讀的目標。這時候大陸的文學雜誌陸續湧進台灣，我著實也讀了不少」。[36]「魯迅、郭沫若的作品正在流行」也與台灣作家吳坤煌（與

35 俍工，《小說作法講義》（中國上海：中華書局，1923.12），出處請見頁25、30、39、40、61、62、121。而孫俍工《小說作法講義》談短篇小說，又主要引述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黃得時所見之作應是孫俍工《小說作法講義》一書，非譯自《近代文學十講》。從二者之比對，可看出「的」、「底」用法之差異，時間差12年，台灣在1935年時已主動將「底」改作「的」。二者之具體對照說明，乃審查委員之提醒，謹致謝忱。

36 翁佳音、張炎憲合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1986.11），頁197。

日本東京左聯關係密切）在1936年報導〈農民劇團と露天劇——中國通信〉介紹中國進步作家的活動相同，他陳述「目前都以介紹魯迅和郭沫若的作品為多，其他前進作家的作品卻像無名作家一樣只是在我等之間流傳」[37]，「魯迅」之作被閱讀傳播情況可見，台灣作家王詩琅、吳坤煌都一致陳述1930年代時接觸了魯迅的作品。

不僅中國文學作品進入台灣的管道多元，[38]台灣作家獲致中國動態的相關報導，今日恐亦有甚多史料未被揭櫫。楊守愚在日記裡多次提到高爾基1936年6月14日說：「從生活日報看到大文豪高爾基患流行感冒，併發腦膜炎之消息，且說是很重態。我不禁為之擔心，像這樣一個大文豪，要是萬一死掉，真是世界文壇上的一大損失，我祝福他能夠再好起來。」6月20日又記載：「高爾基，竟然於十八日午前三時逝世了，多麼可惜啊！」[39]《生活日報》[40]如何進入台灣？迄今不解，這也是首次披露了高爾基的消息是從《生活日報》獲知，那麼做為與高爾基並稱的魯迅過世消息，楊守愚在魯迅去世後的翌日，即在日記上記載他的歎惋，其消息來源恐怕也是從《生活日報》獲悉，有關中國報刊傳遞到台灣，其速度之快，足讓人驚異不已。楊守愚日記尚記載1937年1月24日「到賴和醫院借了冊文學新詩專號。」此冊《文學》（8卷1號）出刊時間是1937年1月1日，似乎是訂閱專戶，台灣作家在出刊當月即閱讀了中國的新詩，時效性不能說不快。又如1936年12月4日記載：「讀完了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再拿了本魯迅的花邊文學來讀。」[41]目前賴和藏書亦見此二書，《俄羅

37 署名「北村敏夫」，原刊《テアトロ》3卷5號（1936.05），收入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頁157。另刊《テアトロ》2卷8號，1936年5月的《中國通信》亦介紹中國演劇演出《阿Q正傳》的劇碼，收入同書，頁150。

38 當時或直接到大陸購買，或透過台灣書店訂購，或由在大陸的親友寄回台灣，或直接在台灣就可買到。

39 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頁29、32。

40 鄒韜奮主編。以「努力促進民族解放，積極推廣大眾文化」為宗旨，精編新聞，重視言論、通訊和副刊。擬從香港遷上海出版，因國民黨當局不予登記未能實現；後增刊改名《生活日報週刊》，繼續在港出版。後遷上海出版，改名《生活星期刊》。鄒韜奮被捕後由金仲華代理編務，不久被國民黨政府查封。此刊與《生活週刊》都是鄒韜奮主持，其間系統脈絡尚待考，《生活週刊》在灌園先生1933年6月4日記載：「既而金生亦取上海出版之雜誌名曰《生活》來示余，因是疲倦頓減，遂不思睡。」《洪水報》3號有篇署名「鐵」的文章〈願一輩子不畢業〉，此文是江灣復旦大學學生「何逖生」所撰，原刊1930.05.11的《生活週刊》。

41 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頁99。

斯的童話》為魯迅所譯，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花邊文學》是魯迅的一部雜文集，收錄魯迅在1934年所寫的雜文61篇，包括〈女人未必多說謊〉、〈北人與南人〉、〈古人並不純厚〉、〈讀幾本書〉、〈玩具〉、〈算賬〉、〈看書瑣記〉、〈漢字和拉丁化〉、〈考場三醜〉、〈略論梅蘭芳及其它〉等，1936年聯華書局出版。從閱讀日期來看，也是當年度的出版品。如此看來，台灣對於魯迅作品的接觸及消息的獲得，豈是由日本傳入而非中國直接傳到台灣？

從以上所述，我們自然可以理解魯迅過世後，王詩琅、黃得時寫了悼魯迅之文，原因就是兩位都熟悉中國文壇，且購置了不少中文作品。黃得時對魯迅的接觸，除了日譯本外，他也透過中文本閱讀《阿Q正傳》，他寫的〈大文豪魯迅逝く〉，除了介紹魯迅的文學生涯，並詳論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與《中國小說史略》及最能體現魯迅戰鬥精神的雜文集。而楊守愚在日記上亦抒發其情：「阿Q正傳的作者魯迅先生，十九日午前五時廿五分逝世了。這是多可歎惋的惡耗啊！」「我於十八九歲時，就讀到先生的作品，覺得他的作品，是平淡裡藏著一股強烈的反抗力。其冷誚，直比之所謂革命文學家之熱罵，還要來得深刻有力。滿期待他再為文學運動、文化運動，放一道燦爛的異彩，詎料於此短短的五十六，便完了他的一生，那是多可惜的！」之後又寫〈悼周樹人文豪〉詩一首以念悼：「細心檢點生前跡，我道先生死若生，單使阿Q存正傳，已堪文史永留名。」[42] 可知楊守愚在1923、1924年時即喜讀魯迅的作品，因而在其小說創作〈夢〉（1931年），塑造了主人公王先生夢中被邀請到上海擔任《前哨》編輯，見到了魯迅、鄭振鐸、趙景深、冰心、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足見楊守愚平時閱讀中國大陸書刊，故能熟悉如此。吾人再從賴和藏書，亦可見賴和購買了魯迅的著作，守愚日記也記載賴和托他向大陸生活書店等購書的事實。到了戰後，楊守愚強調賴和對魯迅的崇拜，在創作態度、解放運動方面，二人見解一致，都重視文藝對人精神的改變，和魯迅「『……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

42 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頁81、82。

然要推文藝』合致。所以先生對於過去的台灣議會請願，農民工人解放……等運動，雖也盡過許多勞力，結果，還是對於能夠民眾的精神的文藝方面，所遺留的功績多。」[43] 以上所論，雖從葉文、林文出發，但同時建構1930年代中魯迅在台的傳播歷程。

三、台灣對魯迅的評價，因戰爭爆發而中斷？

學界普遍認為台灣真正能夠理解魯迅文學的歷史意義，必需等到1936年魯迅去世時，台灣作家才追認他的文學地位。對於魯迅的評價，亦因戰爭的爆發而宣告中斷。殖民地體制下的知識傳播，往往受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以致發生斷裂與跳躍的現象。確實在向來的魯迅傳播過程研究，殖民地時期的魯迅敘述，最多就是到王詩琅、黃得時兩篇悼文，或者略述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兩種狂人日記〉，然後就跳躍到戰後初期的許壽裳、楊逵等人的魯學推動、翻譯傳播上。然而據此一脈絡，魯迅的知識傳播將近十年的空白，似乎也是很不可思議的現象，因而上述論點，仍有其縫隙，尤其戰爭的爆發是否中斷了對魯迅的評價？

葉榮鐘《中國新文學概觀》在1930年出版，對一般文學青年，裨益不少。回到台灣後他籌組《南音》雜誌，並發表〈文藝時評〉（署名擎雲），一開始就切入談「關於魯迅的消息」，他自陳很愛讀魯迅的作品，沒有接到魯迅的作品就很感到寂寞，表露他對壓迫言論之可惡，既對魯迅處境抱不平，也指桑罵槐指向台灣在言論上亦受壓迫。此文也透露出1930年代的台灣已漸進入日本文學的時代，他提醒台灣讀者在只知菊池寬、武者小路、谷崎潤一郎等日本作家外，去接受中國作家魯迅的傑作，並因魯迅「是用手寫還不及用腳跑的忙」，特別期待於不遠的將來能夠接到魯迅先生左傾後的新作品。他將魯迅文學定位為中國作家傑作，對魯迅文學的理解，不可謂不深。文鷗〈遠望台〉強調「文窮而後工」的理念，勸勉台灣作家苦心創作：

43 楊守愚，〈賴和「獄中日記」序〉，《政經報》1卷2期（1945.11），頁11。

> 貧苦中不是不能產生文學。你看當時的高爾基豈不是過著極悲難的生活？就是魯迅、郭沫若至於當時的橫光利一、德永直等等凡世界有名的作家，個個都是抱著空腹隱忍過來的。[44]

文鷗將魯迅與高爾基、橫光利一、德永直等都列為「世界有名的作家」。易言之，在魯迅未過世之前，台灣文壇對魯迅文學地位的描述已很清楚。此外，台灣作家對魯迅譯作亦不陌生，掃雲〈文藝時評〉論及「以生命寫成的文章」，就引錄了魯迅翻譯有島武郎的《藝術與生活》中的一節（按、出自《壁下譯叢》）：

> 想一想稱為世界三聖的釋迦、基督、蘇格拉第的一生，在那裡就發見奇特的一致。這三個人是沒有一個有自己執筆所寫的東西遺給後世的。而這些人遺留後世的所謂說教和我們現今之所為說教者也不同。他們似乎不過對了自己鄰近所發生的事件呀，或者或人的質問等類，說些隨時隨地的意見罷了，並不組織底地，將那大哲學發表出來。日常茶飯底的談話，即是他們留給我們的大說教。
>
> 倘說是暗合罷，那現象卻太特殊，這十分使人反省，我們的生活是怎樣像做戲，尤其是我似的以文筆為生活的大部分的人們。[45]

掃雲這篇文評借魯迅譯文批評了當時舊詩人，文章說「不知道我們島內的文人，尤其是有酒喝，有花（其實是藝妲）賞便有詩，蠅頭蚊翅盡可成詩——而且是才高倚馬一揮立就——的詩翁詩伯讀了不知作何感想。」[46]

台灣文人所認識理解的魯迅不僅是他的小說，對其譯作也頗有接觸。而在魯迅逝世的前一年（1935年），黃得時在《第一線》發表〈小說的人物描

44 文鷗，〈遠望台〉，《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201。
45 掃雲，〈文藝時評〉，《南音》1卷9、10號合刊（1932.07），頁12。
46 同註45。以魯迅譯文有島武郎的《藝術與生活》批評台灣舊詩人，到了1940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時，魯迅作品又意外成為雙方攻防焦點，另見下文。

寫〉[47]，稱讚魯迅《阿Q正傳》小說營造的成功，魯迅逝世，他所撰的〈大文豪魯迅逝く：その生涯と作品を顧みて〉一文，或者之後的〈支那の現代文學〉，黃得時對魯迅文學的理解，從1934年以來，一貫的以「世界的魯迅」的立場來談論魯迅。甚至毓文評論劉捷其人的怕死是他的「深謀遠慮」，並以阿Q來描述此事，他說：

> 有一次劉捷先生、在太平町交通頻繁的大陸上、吃了「漢文仙仔」的虧、被漢文仙仔打得東倒西歪、陷落溝裡、不幸被他的同僚撞見了。越日出勤、那個同僚訕笑劉捷先生說、「劉君！醜體じやないか？」劉捷先生倒若無其事的、泰然地答那個同僚說、「なーに？ギヤソグに會つた位なもんさ！」讀者諸賢、讀此便可窺見劉捷先生的偉大了。這種隱忍自重的超越的精神、除掉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先生、和劉捷先生而外是與（無）從找到的。[48]

阿Q精神顯然已為台灣文人相互調侃的用詞，此外也借用《阿Q正傳》小說的情節，批評保守人士對男女交往的錯謬想法，如一葉〈「會面」結婚論〉，呼籲台灣男女應該努力「開闢男女間自由交際的關門」，其中一段特別提到「他們似乎皆是阿Q的同志，『一男一女在那裡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他們對於男女間的交際，除起淫字以外是沒有別的感想的」。[49]台灣文壇甚至還有以魯迅小說中的人物為筆名。[50]誠如楊雲萍所言「最大的影響就是魯迅先生。他的創作如《阿Q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省的雜誌上，他的各種批

47 黃得時，〈小說的人物描寫〉，《第一線》2期，頁75-83。寫作日期是1934年10月17日，時間遠晚於佪工《小說作法講義》，黃得時手中版本極可能是1933年9月9版者。

48 毓文，〈同好者的面影（二）〉，《臺灣新文學》1卷4號（1936.05），頁89。

49 一葉，〈「會面」結婚論〉，《南音》1卷9、10號合刊（1932.07），頁4。

50 如林克夫以「孔乙己」為筆名在《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上發表了新詩〈日光下的旗幟〉。徐坤泉以「阿Q之弟」為筆名發表了《暗礁》、《可愛的仇人》、《靈肉之道》等作品。毓文素描林克夫時說：「孔乙己是他的匿名」，見毓文，〈同好者的面影（三）〉，《臺灣新文學》1卷5號（1936.06），頁89。另一異說是歸諸為賴和之筆名，謂「1935年7月，以孔乙己筆名於《臺灣文藝》2卷7號發表〈日光下的旗幟〉。」見林瑞明編，《賴和影像集》（彰化：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2000.05），頁226。恐以毓文（廖漢臣）所言為是，《賴和影像集》誤收。

評、感想之類，沒有一篇不為當時的青年所愛讀，現在我還記憶著我們那時的興奮」。[51] 從魯迅作品於1923年就在台灣被閱讀，至1936年魯迅過世之前，相關的魯迅作品認知及傳播，並未中斷過，即使到了中日戰爭爆發，魯迅依舊被談論，因此戰爭的爆發是否中斷了對魯迅的評價？在楊傑銘的論文〈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裡有一部份觸及戰爭期的台灣文壇如何討論魯迅時，他說「當時因為日本殖民政府廢止『漢文欄』，加上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開戰，使得中國作家作品在台的轉載中斷。雖仍有部分討論魯迅的文章，但相較於其他時期，本時期的文章數量顯得最少。」「目前資料所知，當時談論魯迅相關文章一共有兩篇，分別是：〈支那の現代文學〉、〈二つの《狂人日記》〉。另外還有兩篇〈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追憶賴和〉是有提到魯迅，但著墨的篇幅不多，且這兩篇文章都與賴和有關。」[52] 楊文指出戰爭期間魯迅之作依舊被評價，尤其是龍瑛宗的〈二つの《狂人日記》〉，以之與果戈里《狂人日記》並列評述，深刻而有洞見，此文很難漠視不見。然而當時再次引爆的新舊文學論戰，一再以魯迅思想作品做為討論，更是一道特殊的景觀，而這也是目前論及魯迅與台灣文學時所忽略的，做為戰爭期的台灣文學幾乎是被皇民文學、外地文學、糞寫實主義等議題羈占，作品也當然耳認為清一色是日文之作，因此楊文說「日本殖民政府廢止『漢文欄』」、「中國作家作品在台的轉載中斷」，學界研究成果已可確知日本殖民政府並未下令廢止漢文欄，而是幾個報社觀察上意，主動廢止報刊漢文欄，[53] 而殖民地當局對漢文的態度是既利用又威嚇，在日支親善宣傳及侵略戰

51 楊雲萍，〈紀念魯迅〉，《臺灣文化》1卷2期（1946.11），頁1。

52 黃得時，〈支那の現代文學〉，《臺灣時報》242號（1940.02），頁128-143。龍瑛宗，〈二つの《狂人日記》〉，《文藝首都》8卷10期（1940.12）。黃得時，〈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2卷4期（1942.10）。楊雲萍，〈賴和氏追憶〉，《民俗臺灣》3卷4號（1943.04），頁30-31。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頁107。

53 報紙廢除漢文欄的內幕，見諸《昭和新聞》：「台北開催全島國民精神發揚民風作興會。席上有提倡新聞雜誌漢文廢止者。軍部贊成。內地人一部分贊成。新聞社方面亦贊成。據台中州對此問題調查結果。廢止無妨。既登諸報紙矣。」此則材料由翁聖峯首先提出，見〈崇文社課題錄 漢文有輔助和文並國語普及之必要新聞雜誌不可廢漢文論〉，1937.01.07，14版。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01），頁184。有關漢文欄廢止，學者河原功與中島利郎及林莊生都有相關研究，另見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台灣式白話文面貌」〉（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爭發動之際，北京語通譯人才亟需的情況下，我們看到當局也廣設北京語講座，以中文為教材教本，嵐映（林荊南）也明確指出：「自中國事變以後，在這短短的幾個年，我們島民因學習北京語而得著漢文素養的，其數字是不可輕輕看過的，而且，這些攻習北京語的，所得的卻不是古文，不消說是白話文。」[54] 同時期刊雜誌也屢見中國作家作品在台轉載刊行，其例甚多，從筆記小說到鴛蝴派作品及現代文學、譯作，源源不絕，數量之多，恐超出吾人之想像，而這正是日華親善、認識中國的需求下，所形成的特殊現象。在翻譯上，林語堂的作品，如《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被翻譯被介紹，即是亞細亞主義下的考量，而在介紹林語堂其人其事，指出林語堂著作《吾國與吾民》以剖析中國民族的性格之後，與魯迅其人與作品相互比較，[55] 亦是當時基於認識理解中國民族性、國民性之必需，魯迅其人其作之引介，在日本東亞論述需求下，自然有其存在空間。

此外，戰爭期再度引發新舊文學優劣之爭，「魯迅在頭腦化石的人們底眼中，視為危險人物」之論戰，容下文再詳述。此處先述論戰之前台灣文壇對「文學」的討論，已觸及文學的新舊，可謂是新舊論戰的先聲。懶系（林荊南）〈病〉[56]，透過一群文友的相聚，討論新文學者的使命，文中的病夫代表了東亞病夫（文中稱他「東方君」），一個想靠精神力克服病魔和障礙而不圖面對現實，積極治病增強體力的舊文人，作者似乎藉此形象指射台灣舊文人的脫離現實環境，以致最後完全不能自由行動了。文章從北風凜凜的晚上敘述起，病夫因身體不適不想參與當晚眾文學好友的東亞俱樂部之約。

> 莎蔓問道：「怎麼去不得？今晚上的會是很有意義的，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消耗時間的聚會，而且，春初去廣州的描汶君剛剛回來，也要出席這

54 嵐映，〈認識〉，《南方》157期（1942.08.01），頁19。

55 鹽見薰，〈支那の喜劇と林語堂の悲劇〉，《臺灣警察時報》177號（1941.12.15），頁20-21。在《南方》164期（1942.11.15），刊有「台北南風出版社編輯部徵書」啟事，魯迅所有著作在徵求之列，與徵求二十四史、十三經注疏、福建通志、台灣通史、台灣全志、台灣文化志、福建台灣關係圖書、媽祖關係圖書資料、清代重要著作、手抄歌仔簿等同為徵求標的，可見魯迅著作在戰爭期並未被遺忘。

56 懶系，〈病〉，《南方》148期（1942.03.01），頁16-18。

個會，你不出席，可不是有失禮的地方？」

這篇散文頗有實錄意味，描汶君應該就是1942年初剛從廣州回來的朱點人。病夫無法「堅拒莎蔓的嘲語和腕力的催追（逼），只好搖搖抖抖地跟著他走了」。作家到齊之後，描汶先問候病夫的病情；病夫回以「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感歎「病」又不是自討來的。期望文友們健康可以分擔文學的工作，建設一個理想的園地。文滸接著將話題轉到：

> 今晚上的聚會是要討論文學，……請大家言歸正傳，進入本問題去討論怎麼？
>
> 而啟民對從事文學滿腹委曲，一開口便氣憤表明「不要再提文學了！」，他說：
>
> 「我希望大家別要提起文學，文學有甚好處？中國的大文豪魯迅先生於臨終的時，叫他的兒子們不可跑『文學』這條路！大家想一想，這條路可不是很危險的？」
>
> 守昌接著說：「不錯！這條路是十無一利的。我聽見某文學家說：『幹文學對於孤貧夭要領一個……』事實幹文學的百中之九十九沒有一個好的結果。」（頁17）

啟民以魯迅給兒子的遺言，否棄再走文學的路子，[57] 守昌也接續啟民的話，說出文學這條路是絲毫沒有一點好處的，這時描汶生氣似的回說：

> 「胡說！文學不是排功利架子的，又不是在因果上爭頭角的；文學就是文學，幹文學的本人就是文學的使者；一旦是為文學的使者，須要履行文學上的職責，不可對文學抱了不平抱著不平的是沒有談文學的資格！」（頁17）

57 台灣文壇於戰爭期特別喜歡拿魯迅這段話討論「文學」，林觀〈無聊〉與懶糸〈病〉同一期刊出，這篇散文一開始同樣引用魯迅的〈死〉：「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以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以此發發對文學的牢騷，說文學是世界上最不中用的東西。林觀，〈無聊〉，《南方》148期（1942.03.01），頁9。引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描汶認為文學絕不是以功利為目的，而且進一步指守昌的主張，不但沒有談文學的資格，還是個反背文學的毒蟲。但病夫依舊贊成守昌的意見，對描汶說法不服氣，而攻擊著描汶：

> 「不服！不服！守昌君說的是真理。幹甚麼文學？照我的經驗來說：我若是沒有因為太忠實于文學，也不免弄到一身的病骨，受你們嘲笑！時代已經不許文弱者生存了！」。

莎蔓也馬上向病夫攻擊道：

> 「莫怪你弄得一身病骨，因為你是守古香古色自討來的病。描汶君所說的是新文學；大概你還沒有能夠知道新文學是甚麼文學，所以敢說那樣的傻話！」

病夫又是不服似的說：「文學就是文學，有甚麼叫做新文學？」此時與朱點人情誼甚篤的文友湘賓（湘蘋）以「老龍鍾漢」、「黃花閨女」等譬喻詳實說明新舊文學的分野。湘賓說：

> 「你不知道麼？虧你也敢列這個會，病夫君！我告訴你，你所學到的文學，是叫做舊文學，是好似一個戴玳瑁邊眼鏡，穿厚底朝靴，披藍寧綢袍子，罩天青緞子馬掛的年老龍鍾漢。新文學是好似長袖善舞，姿勢綽約，荳蔻年華的黃花閨女。換言之：新文學就是有淚有血的人生文學；有時代性的統一文學；有彈力性的綜合文學；有建設性的普羅文學；有理智的精動文學；並不是『自私自利；個人主義；供個人消遣；貴族式；替將相豪傑作言行錄；論神說鬼；描寫風花雪月才子佳人；雅人說雅話的文學。』……」

湘賓所謂新文學的定義是能感動、有淚有血的人生文學、具有彈性與多元建設性啟迪民智的普羅文學。它不是專屬於個人主義及文人雅士專有的。此文已透露新舊文學的論爭氣息。很快的，在1942年5月1日，朱點人以「描」為筆名，

發表〈我的散文〉「三、論『文人無行』」，以讀書與人格的對照展開論述，又舉柳公權說：「『字為心畫』，有人說：『文者人也』；『大概心地陰險的人，其作文也，他的詭氣自然會流露於字裡行間。』」此文先說明過去舊詩人以為討論就是相罵；相罵就是討論；而且真的『他們』除了相罵之外，別無所長，此下文章舉了最近舊文人對魯迅的利用，說：

> 統觀整個的相罵，都傾於人身攻擊。……「若崇拜魯迅，卻須仔細才好」；這完全是恐喝！超出相罵之外的，它的背面的意思是：魯迅何等人也？你敢崇拜他！我若……你就……。當時我不知道魯迅是怎樣的人，若照它的口氣，魯迅好像是蛇蠍；後來查看文藝辭典，纔知他原來是世界的底偉大作家。學貫東西，他的作品被譯成世界各國語；這豈是頭腦冬烘們望塵得及的？改造社尚出他的全集，怎見得崇拜魯迅，就要「仔細才好」？他的心地真是陰險！恐蕃仔也恥與為伍呢！我讀其文，覺得「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撲人」！[58]

在論戰期間，朱點人以數篇「論文人無行」加入討論，對於批判魯迅者，他更極力與舊詩人王筱庵、鄭坤五相辯駁，從《南方》154至158期多篇文章往返論戰，其中一再針對「魯迅，何等人也？你敢崇拜他！我若……你就……」、「對崇拜魯迅的，我（鄭坤五）卻不願和他討論魯迅的文學。因為我要謹慎一點點」、「提防他（魯迅）是危險人物」、「魯迅的思想不穩健，要小心」、「魯迅在頭腦化石的人們底眼中，視為危險人物」、「崇拜魯迅的要注意」、「崇拜魯迅……的人是心地陰險」。[59] 在戰爭末期的新舊論戰，魯迅及其思想不意成為彼此相互攻防的對象，甚至以左翼、魯迅等危險思想來威嚇台灣新文學作家。當中日戰事爆發，皇民化運動推行，台灣境內言論自由的管控隨之更

58 描，〈我的散文 三、論「文人無行」〉，《南方》151期（1942.05.01），頁18。

59 本回論戰起自1941年5月至1942年9月主編要求停戰，歷時一年四個月，參與論戰者眾。引入魯迅以論戰的則較集中在151至158期，這些文章有筱庵〈台灣詩人毛病論餘燼之管見〉、描〈我的散文 三、論「文人無行」〉、坤五〈文戰後的聲明〉、描〈我的散文（六）〉、〈細菌與微生物〉、王筱庵〈奉答描先生〉、〈再奉答描先生〉等。

為險峻，日本境內左翼作家不少人發表了轉向聲明，而台灣左翼活動在1930年代亦多遭打擊，進入1940年代的環境更為嚴酷，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舊文學論戰再度引燃時，舊文人對於左翼魯迅自然「要謹慎」，不與人討論魯迅，甚且冠以魯迅思想不穩是危險人物的帽子，其中考慮就是唯恐稍一不慎給自己帶來麻煩。綜觀魯迅在台的傳播歷程，進入日治的第三階段，不再是黃得時、王詩琅在魯迅剛過世時的崇高定位，而是肯定及否定魯迅之文學與思想者均有之，而這一切似乎也與戰後國民黨統治時期一樣，魯迅的形象、評價、地位隨著政權更迭及意識型態而變動不居。

四、小結

由於同文的關係，魯迅文學被介紹到日治時期的台灣算是很及時，遠比朝鮮、越南都要早，接受管道從初期的向中國訂購及攜入，進而轉載報刊雜誌，另一管道則是日本本土（尤其是《改造》、《中央公論》及岩波書店、京華堂、文求堂），在報刊及座談、日記、回憶錄、口述歷史都可見到殖民地時期的魯迅傳播描述，因而魯迅與台灣文學的關係究竟如何？事實上很難量化，也充滿複雜度及不確定性。本文僅就目前可見的論述，輔以較新的材料，重寫魯迅在台灣的迴響。雖然魯迅不曾與台灣直接發生過關係，但間接上卻是有的，1923年許乃昌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恐是當時最早介紹到魯迅的一篇文章，其後（1925年）蔡孝乾也在《中國新文學概觀》指出魯迅的小說「不特描寫的手法，大起變化，描寫的對象（材料），也有變化，漸及于平民社會——農民、職工、車夫，或由新舊思想衝突而引起的家庭悲劇、結婚痛苦等」，張我軍更在1925年《臺灣民報》3卷1號首度刊登魯迅的作品〈鴨的喜劇〉，自此魯迅文學漸為台灣讀者所認知，魯迅作品的人道主義寫實筆法及戰鬥批判的精神，啟發了一些作家，甚至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影響。[60]

此後便是台灣青年與魯迅的接觸，據黃旺成先生回憶，張我軍訪問魯迅

60 除賴和外，汪景壽認為張我軍〈白太太哀史〉的開頭寫法受魯迅〈故鄉〉的影響。見汪景壽，〈抽刀斷水水更流——略論三十年代文學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2年第1期，頁4。

時，曾請教魯迅有關台灣青年在日本統治下，應如何尋找出路的問題，魯迅回答說：「不要冒動，台灣人直接無法打倒日本，應以間接射擊的方法，參加中國抗日行列才是。」[61]「間接射擊」之意，即是借助中國反帝運動的力量達成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目標。另外，1927年對中國不僅是一個關鍵的年代，台灣青年張秀哲、張深切也在這一年親炙了魯迅的教導，從1920年代中至1936年，約十年的時間魯迅作品被閱讀被重視，甚至理解其作品意義，確認魯迅文學地位都在這個時期，因此1931年2月《臺灣新民報》刊登三則與魯迅被捕有關的消息，深刻體現台灣人士對魯迅的關心，後來魯迅去世消息傳來，台灣文壇也立即反應。同時，作家引用、摹仿魯迅之作時見，定一〈曲解　第一〉引用了《華蓋集》中的〈通訊〉，左翼報刊《洪水報》刊出劉宗敏摹仿魯迅〈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的新詩〈無題〉。魯迅舊詩刊在《福爾摩沙》，《南音》刊出「吼」（周定山）〈草包ABC（六）文學的暴君〉，張深切點出周定山所受到魯迅雜文的影響，到了1934年後的《臺灣文藝》、《第一線》、《臺灣新文學》更經常可見援引魯迅作品，黃得時的〈小說的人物描寫〉舉魯迅《阿Q正傳》為典範，引用魯迅譯作〈工人綏惠略夫〉，「魯迅」之作被閱讀傳播情況可見。在1937年事變發生前，楊守愚日記更是如實傳達了魯迅作品被喜愛及崇拜的程度，楊守愚強調賴和對魯迅的崇拜，而他本人亦如是，透過以上種種史料，重新建構了1920年代中至1930年代中魯迅在台的傳播歷程。

在此階段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臺灣文藝》的〈魯迅傳〉無意間引發了郭沫若的不快，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謬誤〉一文的回應，也使魯迅不悅。可這兩位大作家卻在當時文壇並舉，台灣作家王詩琅、吳坤煌都一致陳述1930年代時接觸了魯迅的作品，魯迅和郭沫若在他們客觀的陳述下，都說二位為眾人所崇拜。從魯迅的討論裡，吾人自然也不能忽略郭沫若與台灣的關係，姑且不論呂赫若的筆名是否一字取自「郭沫若」，在《吳新榮日記全集》就多次提到閱讀

61 黃旺成先生回憶當年新竹以施姓青年為首的熱血青年十數人，受到魯迅提出「間接射擊」概念的影響，欲前往中國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後事跡敗露被查獲。見王世慶訪問，〈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93。

郭沫若之作，[62] 提及之次數還遠遠比魯迅為多。[63] 大致而言，日文作家偏重郭沫若，中文作家偏重魯迅，當然都是台灣文壇知名的新文學作家。何以如此？恐與吳坤煌、吳新榮、呂赫若左翼思想的色彩有關，他們又都是留日、使用日文創作，而郭沫若當時在日本，與東京左聯及台灣人士亦有接觸。中文作家如賴和、楊守愚、周定山、王詩琅、朱點人等，則直接閱讀魯迅的中文作品為多。[64]

魯迅過世是魯迅被關注的高潮，可以想像當時欲想研讀其作品的盛況。未幾，事變爆發，魯迅作品稍沉寂，但依舊像地火不滅，仍在奔突，即使是戰事日亟，嚴禁左翼的時代，台灣作家龍瑛宗[65] 、吳新榮、朱點人、周傳枝依然私下閱讀魯迅的作品，在1942年新舊陣營對立時，早已過世多年的魯迅，甚且意外地成了筆戰焦點，魯迅其人其作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攻擊目標，就1940年代魯迅文學的傳播而言，呈顯了相當有趣的畫面，前五年是禁止階段，後數年是蹈厲發揚的熱鬧場面，但隨即又沉寂噤聲，這一切發展都與政權更迭有關，

62 《吳新榮日記全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2008）提到的相關記載，如1936年12月28日日記說郁達夫：「是魯迅死於中國和郭沫若並肩為中國文壇的重鎮。」（第一冊，頁271）吳新榮以白話文書寫，這句有些彆扭，但他特別標舉郭沫若。1938年3月24日日記閱讀《支那古代社會史論》，說：「只能驚訝于作者郭沫若的偉大。」（第二冊，頁221）8月12日又載續讀郭沫若的《支那古代社會史論》（頁287），8月15日又自勉一定要讀完此書。1939年2月19日載楊雲萍贈以郭沫若的著作（第三冊，頁196）。8月15日載：「威爾斯的《世界化史大系》、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和這本石川三四郎的《東洋古代文化史談》，是我歷史研究之根源與文化認知之書籍吧。」（第三冊，頁267）1940年9月1日載村上知行的《支那與支那人》此書可以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石川三四郎的《支那古代文化史談》、林語堂的《吾土吾民》、後藤朝太郎的睡著的獅子」等相提並論，都是該讀的書。」（第四冊，頁260）1945年9月16日載讀胡適的《嘗試集》，「因為新式的作法，致使不能大瞭解，也不如讀郭沫若詩集之時的感激。」（第四冊，頁193、194）1946年9月2日載「讀《文萃》裡郭沫若的〈哭多災戰士〉的詩，興憤（奮）過頭，致使致夜明也不能就眠。」（第四冊，頁300）以上提到郭沫若著作《支那古代社會史論》（日譯）、《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文）尤其讓吳新榮感佩不已，但書名記載有所出入，愚意吳新榮寫日記時並沒拿原書查證，而只是憑記憶寫下，其時也沒書名符號，但今人編輯整理日記時，都加上了書名號，以致更感到書名不一。

63 1947年2月8日的日記，吳新榮提到應台中文化交流社的請求，寫《紙上談兵》，他「主張兵卒也有兵卒的權威，提唱文化人的組織統一化，強調文化人要認識自己的力量，理解他人的行動，最後結論文化人要繼承魯迅和平的革命傳統底文化遺產。」（第八冊，頁352）

64 如楊守愚日記1936年6月16日「讀郭沫若君著《創作十年》，覺得很無味，尤其同魯迅相罵那開頭幾頁，更沒意思，要不是他郭先生有那麼一個大名聲，像這樣一個集子，怕不會有多少人讀呢。」（頁31）當魯迅與郭沫若並置時，可以看到楊守愚對二人的評價，短短兩行他做出對郭沫若的《創作十年》「覺得很無味」、「更沒意思」、「不會有多少人讀」的議論，態度明顯偏向魯迅。

65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引用了魯迅的《阿Q正傳》、《故鄉》，戰後在《中華日報》文藝欄繼續發表《阿Q正傳》，介紹魯迅作品。1991年他給杜潘芳格的信函說：「台灣的作家中有人寫文章寫得比魯迅出色，然而，比魯迅更加深刻的體會著文學精神的人是沒有的。魯迅依舊是我們的導師。」見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第八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頁80。

但無論是日本殖民還是國民黨政權，魯迅作品雖然沉潛於地表下，等待破土而出，黑暗中的漫漫追尋，最後終究撫慰了人心，溫潤了作家心靈。[66]

66 姚一葦書房的門口掛著藍底白字的布廉，印有魯迅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且將女兒命名為海星，他說：「正是。魯迅的兒子叫海嬰，我的女兒叫海星，這是我對他的敬意和學習。」接著他又問：「你們知道魯迅說的那句話給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他在遺囑上吩咐兒子的一句話：不要當空頭的文學家！」見尉天驄，〈和姚一葦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中央日報》，1997.04.30，33版。葉石濤曾說他讀遍魯迅的小說和雜文，見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頁11。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鹿窟哀歌〉及郭松棻〈雪盲〉及陳映真〈夜霧〉、李渝〈江行初雪〉、〈朵雲〉、劉大任等等或多或少都可見影響痕跡。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北方左翼文化運動資料彙編》(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06)。

中島利郎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5）。

王德威、陳思和、許子東主編，《一九四九以後 當代文學六十年》（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03）。

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

林瑞明，《臺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3.08）。

———編，《賴和影像集》（彰化：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2005.05）。

施懿琳編，《周定山作品選集（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07）。

孫俍工，《小說作法講義》(中國上海：中華書局，1923.12)。

孫郁編，《被褻瀆的魯迅》(中國北京：群言出版社，1994.10)。

翁佳音、張炎憲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1986.11)。

翁聖峯，《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01）。

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12）。

郭松棻，《奔跑的母親》（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07）。

陳萬益編，《龍瑛宗全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

彭莉編，《台灣研究新跨越 兩岸觀察》（中國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06）。

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07）。

楊洽人、許俊雅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2）。

魯　迅，《華蓋集第4集》（中國上海：北新書局，1929.05）。

———，《魯迅書信集（上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08）。

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魯迅全集・第三卷・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

———，《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 二心集 偽自由書》（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12）。

韓石山著，《徐志摩傳》（中國北京：文藝出版社，2004.0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文鷗，〈遠望臺〉，《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201。

汪景壽，〈抽刀斷水水更流——略論三十年代文學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世界華文文學論壇》1992年1期，頁4-9。

周定山，〈草包ABC(六)文學的暴君〉，《南音》1卷9、10號合刊（1932.07），頁25-28。

林瑞明，〈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魯迅與賴和〉，《國文天地》7卷4期（1991.09），頁18-24。

楚女（張深切），〈評先發部隊〉，《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11），頁5-11。

嵐映，〈認識〉，《南方》157期（1942.08.01），頁18-19。

描，〈我的散文 三、論「文人無行」〉，《南方》151期（1942.05.01），頁18。

黃得時，〈小說的人物描寫〉，《第一線》2期（1935.01），頁75-83。

———，《輓近の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2卷4號（1992.10），頁2-15。

楊守愚，〈賴和「獄中日記」序〉，《政經報》1卷2期(1945.11)，頁11。

楊傑銘，〈論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與《臺灣新文學》中魯迅思想的傳播與接受〉，《國史館館刊》26期（2010.12），頁47-74。

楊雲萍，〈紀念魯迅〉，《臺灣文化》1卷2期(1946.11)，頁１。

———，〈賴和氏追憶〉，《民俗臺灣》3卷4號（1943.04），頁30-31。

毓　文，〈同好者的面影（二）〉，《臺灣新文學》1卷4號(1936.05)，頁88-90。

———，〈同好者的面影（三）〉，《臺灣新文學》1卷5號(1936.06)，頁88-90。

蔡輝振，〈魯迅在台灣——探討台灣對魯迅研究的成果〉，《上海魯迅研究》16期（2005.04），頁108-133。

黃得時，〈小說的人物描寫〉，《第一線》2期（1935.01），頁75-83。

龍瑛宗，〈二つの《狂人日記》〉，《文藝首都》8卷10期（1940.12）。

擎雲(葉榮鐘)，〈文藝時評〉，《南音》1卷3號(1932.02.01)，頁14-16。

魏家駿，〈覺醒的階級和死去的時代——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一種解讀〉，《文學評論叢刊》6卷2期（2003.10），頁75。

懶系，〈病〉，《南方》148期（1942.03.01），頁16-18。

鹽見薰，〈支那の喜劇と林語堂の悲劇〉，《臺灣警察時報》177號（1941.12.15），頁20-21。

（二）學位論文

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面貌」〉（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楊傑銘，〈魯迅思想在台傳播與辯證（1923-1949）——一個精神史的側面〉（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三、報紙文章

定一，〈曲解 第一〉，《臺灣新民報》282號，1929.11.03，頁8。

尉天驄，〈和姚一葦先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中央日報》，1997.04.30，33版。

陳漱渝，〈在魯迅蜚聲中外的散文詩集《野草》中，有一篇形式特異的作品《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魯迅為什麼寫《我的失戀》？〉，《湛江日報》，2009.10.18，6版。

黃得時，〈支那の現代文學〉，《臺灣時報》242號（1940.02），頁128-143。

四、電子媒體

〈張深切《里程碑》的魯迅印象——先從自己救起〉（來源：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413，domo ，檢索日期2014.08.25）。